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贵州考古实证

李飞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这一重要论断，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哲学思考，系统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气韵。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文明并非西化的观念，而是凝结于具体的物质遗存。在贵州考古发现中，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都有清晰的表达。

从洞穴遗存到夜郎国，中华文明在贵州生根发芽，自此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1964年，黔西观音洞遗址的发现，揭开贵州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序幕。经过60余年的探索，迄今已在贵州大地上发现史前洞穴遗址约500处，数量之多、内涵之丰富，居全国前列。目前的考古发现可以较为完整地构建贵州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年代序列。早期的代表性遗址有盘县大洞、黔西观音洞；中期以水城硝灰洞、毕节扁扁洞为代表；晚期则有普定穿洞、贵安牛坡洞和招果洞等。其中，盘县大洞、贵安牛坡洞、招果洞遗址曾获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距今一万年左右，生活在贵州的古人琢磨石器、抟土烧陶，逐渐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文化。大部分人群延续了穴居的生活方式，部分人群逐步迈向旷野、逐水而居，乌江、南北盘江、锦江、赤水河等流域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形成以黔中为中心，各流域为通道的车毂般四方辐辏之势。距今3000年左右，贵州高原进入青铜时代，威宁鸡公山、毕节青场等遗址发现了贵州最早的青铜器和大量炭化稻米遗存，标志着农业与手工业在贵州的兴起。“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

郎最大”，这个神秘的国度，代表了贵州土著文化发展的高峰，从这个时期开始，贵州进入了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从技艺创新到设省而治，中华文明在贵州革故鼎新，不断辉光日新。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贵州先民，掌握了一种利用扁平砾石获取零台面石片的新技术——锐棱砸击法，被认为是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标志，对周边产生了较大影响。同一时期，红色赭石在普定穿洞、贵安牛坡洞等遗址中被发现，标志着审美意识的出现。迟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黔渝湘鄂交界处的武陵朱砂成矿区的朱砂资源被开采，销往长江下游的良渚。同位素示踪技术显示，商周时期，四川三星堆、山西晋阳钟村、湖北叶家山、宁夏姚河源等遗址中发现的朱砂，部分产地指向贵州务川与万山。战国中晚期至秦代，活动于武陵山地的巴人寡妇清家族因经营朱砂而富甲一方。在务川大坪发现了西汉时期朱砂开采、管理与贸易密切相关的从业者墓地。明永乐年间，思州、思南宣慰使为争夺砂坑之利而兵戎相向，朝廷遣使调解却被无视，震怒之下废除两大宣慰司，设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开启了贵州设省而治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万山汞矿是我国出口的主要物资之一，被誉为“爱国汞”。“一颗‘红色丹砂’，打通了大山内外的物质与文化联系。贵州是郡国并治、羁縻之治、土司制度的实践地，所获经验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

从羁縻而治到设省建制，中华文明在贵州聚指成拳，逐渐团结统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依托数千年大一统历史传承，铸就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鲜明统一性特质。从考古寻迹贵州发展史，完整呈现地域文化由多元萌生、逐步融为一体的演进脉络。盘县大洞古人类遗址实证远古先民在贵州繁衍生息，

拉开贵州人类活动历史序幕。自新石器时代迤南阶段，贵州各地孕育风格迥异的本土史前文化，各类文明自在发展、异彩纷呈，区域间逐步产生自发性、碎片化的文化交流往来。夜郎立国时期，域内多元本土文化整合进程提速，孕育形成集聚力突出的区域性文明形态。秦汉之际，现今贵州绝大部分地域被纳入中央王朝郡县管辖体系，进入大一统国家治理架构，推动贵州由局部区域内部整合，迈入同中原深度联结、纳入国家制度管控的发展阶段。明代是贵州建制发展的关键节点，为经略西南疆土、稳固边疆治理，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正式划为省级行政区，进一步夯实国家大一统治理格局。从羁縻而治到土流并治再到设省而治，中央王朝对贵州高原的管控渐次加强，直接推动了贵州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逐步缩小了与内地的差距。

从汉文化更进到土俗传承，中华文明在贵州兼容并蓄，充分包容互融。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省份，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中相互尊重、包容，保留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加强了对云贵高原的经略。秦开五尺道，西汉武帝时置南夷道，设置夜郎县，纳入中央王朝统治，贵州地区逐步进入“郡国并治”时代，开启了文化发展和多族共融的新局面。西晋末年东晋初年出现“七郡斗绝，晋弱夷强”的格局。所谓“晋弱夷强”，就是汉文化衰落而土著文化开始复兴，且历久不衰，这在魏晋至明的大松山墓地中有充分体现。秦汉郡县制的推行令贵州土著迅速汉化，魏晋以后，则再现土著化浪潮。从先秦经两汉至魏晋，贵州历史文化经历了土著一汉化一土著的螺旋式发展。

宋明时期的播州土司，在接纳华夏礼仪的同时，还保留了在墓葬腰坑中随葬铜鼓的习俗。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鲜明体现。明代设省之后，大量汉族移民进入贵州，留下了大量的卫所、屯堡遗存。即便如此，大量族群仍在夷汉交往中保持着自身特色，到清代还有“百苗”之称。多民族共融共生的多彩贵州，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最佳注脚。

从可乐遗址到夷汉相融，中华文明在贵州守望和善，长期交融共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这一理念，是贵州历史上各族群在交往中的主旋律。赫章可乐遗址为我们提供了早期族群和平共处的珍贵画面，这里发现战国秦汉时期遗存19处，包括居址4处、墓地15处近千座，分属夷、汉两个族群。战国至西汉早期，南夷族群重要人物下葬时头置铜釜或铜鼓，行“套头葬”，并佩戴发钗、戴玉块、持戈剑，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西汉中期开始，汉式墓葬逐步涌现。与此同时，一座汉城出现在可乐河与麻腿河交汇处的台地上。遗址内近年发现的汉瓦当表明其是建为郡汉阳县（或汉阳都尉）治所，隗嚣、永平等纪年瓦当表明建城年代不晚于西汉建始年间，至东汉永平年间。从战国晚期至东汉晚期的数百年间，在可乐这个不大的地理空间内，夷汉和谐相处，彼此接纳，有的土著首领还将铭有“敬事”二字的铜印与铜铃做成串饰悬于颈下而入葬，以示珍视，“敬事”二字体现了当时不同文化间相互尊重、和睦交往的相处之道。

贵州的考古实证表明，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形塑了我们的过去，也必将影响我们的未来。

(作者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播州土官杨价墓实验室清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大松山考古发掘现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这一重要论述为健全用好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引导干部担当作为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贵州正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各项部署，奋发有为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深入理解内涵、精准用好容错纠错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鹏

守住容错界限。容错纠错是指对领导干部在履职担当、改革创新过程中因先行先试缺乏经验而导致的失误、过失或错误，经过客观评价，依规依纪依法不予追究或者免于追究责任，或者从轻、减轻追究责任，同时纠正失误和错误，总结问题、推动整改的制度。凡是明知故犯、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谋取私利的行为均属不可容之错，这是划定容错的界限。不可容之“错”，是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在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以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

把握容错原则。容错工作，应秉承干事创业为上、坚持实事求是、依纪依法、容纠并举的原则。一是甄别主观动机。判断是基于“公心”推动发展，还是为谋取私利或局部利益；是干事创业中对旧政策面临新问题时修正与调整，还是有规不遵、有纪不守的任性妄为。二是甄别决策程序。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是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明确要求，除非面临可能造成国家、社会或个人利益难以弥补损失的紧急情况需当机决断，其他情形下均应遵循相应的程序要求。三是完善评判标准。结合失误和错误的性质、后果、影响大小，以及补救悔错的态度和挽回的实际效果，进行综合认定。

规范容错程序。容错纠错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要严格按照规定权限、规则和程序开展。程序严谨是容错结论客观公正的重要支撑，责任追究机关在追究问责工作中，应同步核查被调查对象是否具备容错情形，全面、客观、公正收集证据，充分听取被调查对象和有关单位意见，注重了解包括利害关系方等有关方面的意见，查明被调查对象失误和错误的问题及其原因，通过集体研究的形式对是否容错作出认定。

坚持容纠并举。容错纠错的本意是让全面从严治党与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推动容错对象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补齐短板弱项。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目的在于旗帜鲜明地为改革创新中积极履职、担当作为、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持续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

(作者单位：中共贵阳市委党校)

激活红色文化时代价值

朱仁仰 姚媛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赓续中华文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民族复兴伟力提供了思想指引，也为贵州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文明贵州新风指明了前行方向。新征程上，激活红色文化时代价值、创新红色文化当代表达，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要求，更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

守护红色文物，赓续红色根脉。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红色文物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伟大成就的见证。贵州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是中国革命火种的撒播地、英雄模范人物的汇集地、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地、抗日民族战争的支援地、国防三线建设的战略地、新时代贵州精神的孕育地。红色文物资源十分丰富，单革命文物一项在2025年印发的《贵州省革命文物名录》中明确的就达1207处。近年来，贵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贵州省革命文物条例》等重要法规，立足红色文物保护法定化、体系化建设，正式印发《贵州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规划(2025—2035年)》，明确提出，要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实践地、多彩贵州革命文物强省、全国红色基因传承

示范区、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创新区。这一规划的出台，为全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绘就了清晰的路线图。同时，为守护红色根脉，贵州出台全国首部涉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地方性法规《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条例》，制定《贵州省红色资源认定标准》《贵州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条例》等规范性文件，以法治刚性筑牢红色文物保护屏障，使红色根脉真正得到守护与传承。

创新表达方式，活化红色历史。创新表达是让红色历史走进当代、走进内心的关键方式，要用当代人特别是年轻群体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创新叙事载体，讲述红色历史故事。近年来，贵州紧跟时代发展，探索创新路径，积极拥抱前沿技术，依托数字技术、演艺业态革新，打破红色资源静态陈列的传统模式，让红色历史和红色文化展示“活”起来、“潮”起来，红色文化传承发展呈现出新气象、开创新局面，成为能够与当代人进行跨时空对话的鲜活生命，成为人民大众可接受的精神资源，在新时代焕发出生机。如红色文化演艺“双子星”——“红飘带”和《伟大转折》剧目就是这样的典范。截至2025年10月，“红飘带”运行两年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安全演出超19万场，接待游客200万人次，单日最大接待游客2万人次，成为许多游客抵达贵州后必打卡的“第一站”。“红飘带”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创造性地将厚重的长征历史与新时期的前沿科技相融合，把历史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的沉浸式体验。同样令人震撼的，还有科技与历史碰撞的大型长征文化真人实景沉浸式演艺《伟大转折》。自2024年1月15日首演以来，凭借创新表达、教育赋

能与产业联动，两年间累计吸引观演人次突破65万。

坚持化风育人，铸牢红色基因。红色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的回望，更在于精神的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化风育人”，正是要发挥红色文化在引领风尚、培育新人中的独特作用。近年来，贵州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营造润物无声的社会氛围，全力使红色文化成为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精神滋养。在社会培育层面，构建知行合一的教育体系，大力实施从耳听到心动再到行动的转变；塑造顶天立地的精神脊梁，着力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在研究阐释方面，推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完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党史著作40余部，为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贵州红色文化、全面了解党的光辉历程提供了权威读本。在校园育人层面，大力推进红色文化进校园，全省各地通过“开学第一课”、红色主题讲座、红色经典诵读等形式，将红色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与课后实践，把红色基因植入青少年成长过程，引导广大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党性淬炼层面，依托红色资源打造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构建红色教育培训体系，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推动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使红色教育从课堂听讲走向现场体验，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感悟。

深化文旅融合，释放资源效能。红色文化的传承，既要算好精神账，也要算好经济账。贵州依托自然风光、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史前文化、阳明文

化、屯堡文化等正在探索一条“红古绿特”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通过融入主题、整合片区、纳入线路等方式一体化发展，丰富展示内容和层次，助推“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文旅品牌升级，让红色文化成为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在这过程中，贵州把红色旅游与“黄小西吃晚饭”等重点景区深度融合，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并进，精准对接游客日益多元的兴趣与需求，全力打造红色文化深度体验的新范式。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红色资源与自然山水、民族风情交相辉映，持续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推动红色景点串点成线、连线成面，促进红色文旅持续转化焕新空间，让红色文化在旅游发展中焕发时代光彩。

迈向新征程，高扬红色旗帜。从中共贵州地方组织的秘密建立到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从抗战后方、战略屏障的重要作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奋进征程，红色基因已经深深融入贵州人民的血脉，同时也为有力彰显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作出积极贡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教育引导全省人民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筑牢信仰之基，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铸入灵魂，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要把红色基因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坚定不移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各族群众。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让红色旗帜在贵州大地上高高飘扬，为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文明焕发光彩凝聚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把握新的文化使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要以开放包容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应准确把握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趋势，充分发扬中华文明包容性与开放性的特性，扎根中国，融通中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要以文化自信自强开拓文化发展新境界。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伟大跃迁，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第二个结合”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起高度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知达到了新高度。新征程上，要继续以“第二个结合”夯实文明发展根基，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自主姿态屹立于世界。

(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以“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

王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将“第二个结合”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揭示了其以价值融通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十五五”时期，必须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彼此契合的内在机理与运行规律，在融通创新与双向赋能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融通。“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其核心在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契合”到“结合”再到“创新”的内在逻辑演进。“契合”在于根脉相连、

价值相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持物质第一性原则，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传统知行观形成方法论呼应，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传统“天下大同”愿景本质相通。“结合”在于双向赋能、相互成就。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科学内核与时代内涵，唤醒传统文化活力、破除历史局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筑牢文化根基、塑造民族表达，激活理论本土化内生动力。“第二个结合”既为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开辟新境界，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生命。“创新”在于融通互鉴、赓续发展。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从“大道之行，天

下为公”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随着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结合”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彰显人类文明共性与中华文明特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具有跨越时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探索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作为“中国具体实际”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在坚持人类文明的普遍性基础上，弘扬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实现共性性与特性的辩证统一。“第二个结合”既是对人类文明共同